

“语录出而文与道判”：宋代理学语录生成的 文体语境与思想动因

陆月，姚爱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语录体”的生成与流行，是两宋性理文体嬗变与儒学思想转型的独特表现。理解南宋后“语录非文”争议及“泛语录化”现象，需回溯至唐宋古文运动的历史语境。北宋性理文本经历了“经解体”、论策“古文”、科举“经义”三种文体类型。从文道关系看，三者虽各有侧重，却均未能化解“为文”与“言道”的内在张力。至二程创立洛学，引发周程、欧苏思想分裂的同时，也造成了“古文”与“语录”的文体分化，为“言道”找到了更为直接切己的表达形式。理学语录正是在这种文道分判的背景下产生，其直录思想情志的方式既契合洛学以“拟圣”为核心的道学本体论，也符合程门居敬穷理工夫的修养需求，并伴随理学官学化的进程逐渐进入文学话语体系。从文体与思想关系角度探讨“语录体”的发生，或可为中国文体学研究提供新的路径。

关键词：语录体；古文运动；文体选择；文道观；理学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5)05-0215-11

“语录”作为文章之一体肇端于先秦、复兴于两宋几成学界之共识。两宋之际，语录全面勃兴、蔚为大观，其数量之盛、程度之深，诸代莫出其右，语录作为南宋以来典型著述型文体的现象亦多为学界所揭橥^①。然长期以来，关于宋代语录的勃兴问题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代乾嘉学派学者如钱大昕、江藩、方东树等称儒家语录乃效仿禅宗语录而盛行于宋；近代如梁启超、胡适、朱自清、刘师培等从白话文学发展视角论及宋代语录之兴，惜沿清儒之说而未及深研；当代学者如褚斌杰、谭家健、杨树增等则从文体学史的视角远溯先秦，以《论语》为宋儒语录之渊薮，又不免受到道统叙事的影响^②。总之，关于宋代语录的复兴问题，诸家虽从文献指认、形式分析，以及道统溯源等不同角度予以阐释，却因囿于不同的时代语境与学术立场，不仅难以探明“语录”何以能从宋代多种“言道”文体类型中脱颖而出、勃兴并盛行于两宋的真正缘由，亦无法解释为何先秦语录及禅宗语录于“文学”影响甚微，直至南宋“语录”才逐渐渗入文学话语体系，进而影响后世文学思想与文体发展路径。

关于上述疑问，在既有研究思路之外，独辟蹊径的创见性研究主要有贾德讷与刘宁的观点：前者从宋代儒学思想转型的脉络中考察宋代代言说方式的转变^[1]，后者则将语录视为宋代理学文体的代表，从文体流变的视角阐述“语录、札记之兴与‘论’之式微”间的历史逻辑^{[2](111)}。此二研究均提示着宋代理学语录的生成绝非对禅门的简单效仿，亦非仅仅溯源《论语》、赓续道统，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思想动因。不过，语录作为与思想联系最为紧密的文体类型之一，从文体或思想等单一视角展开探究难免偏至一隅，若进一步从文体流变与思想转型的交互视角来讨论宋代理学语录的生成与演

收稿日期：2024-11-27；修回日期：2025-03-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语录类文献整理与儒家话语体系建构及传承的研究”（20&ZD265）

作者简介：陆月，女，四川资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中国文化与诗学，联系邮箱：mg1708005@smail.nju.edu.cn；姚爱斌，男，安徽枞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中国文化与诗学

变,当可对“语录”进入文学话语体系的进程作出新的解读,进而开掘出宋代文体不变语境下“语录体”生成的文体学线索与思想史意涵。

一、北宋性理文本的二重倾向与文体类型

两宋之际,文体与思想领域皆发生了重大变革^②,并集中反映于士大夫为文方式与文坛风气的转变之中,此转捩的内在诉求实际上可上溯到中唐以至北宋的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既意味着文体之革新,也表征着思想之变革,更前所未有地自觉将思想与文体纽结到一起。自韩愈标榜“文以明道”以来,后世为文者常以“文”为言“道”之工具。古文运动及其伴随的思想递变与文体兴衰,实质上都处于“文”与“道”的演变过程中,反言之,文道关系是理解北宋文体嬗变的重要锁钥。从韩愈到欧、苏,再到二程乃至朱熹,诸家对“道”的理解不同,其言“道”的主要方式亦随之有变。语录的兴起正是这种对“道”的理解及言道方式变迁所催生的产物,厘清其生成路径,须还原北宋思想论争与文体互动的复杂场域,在“为文”与“言道”的内在张力中加以体认。

北宋古文运动的复兴,带来了性理之学表达体式的显著变化,就其实质而言,则不出陈植锷所谓古文运动之“为文”与“言道”两种倾向^[3]。郭绍虞指出,中唐古文的创制不仅使六朝“文笔之分”走向了唐宋“诗文之分”,更标志着为文方式的变革,如其所言:“等到古文运动成熟以后,就古文家宗经的倾向言,则是以‘言’为文,就古文家兼学子史的倾向言,则是以‘笔’为文。”^[4]我们大略可认为,“以言为文”乃就言道之便利而言,“以笔为文”则就文章之体式而论,此二者恰恰对应于宋初古文运动中“言道”与“为文”的二重倾向。学界从文体形态出发对北宋性理文本的文体类型^④进行了细致的横向划分,但事实上,性理文本多元化的进程与北宋整体文风的历史转变有着密切联系。叶适《习学记言》称:

文字之兴,萌芽于柳开、穆修,而欧阳修最有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继之始大振;故苏氏谓:“虽天圣景祐,斯文终有愧于古”,此论世所共知,不可改。安得均年析号各擅其美乎?及王氏用事,以周孔自比,掩绝前作,程氏兄弟发明道学,从者十八九,文字遂复沦坏。^[5]

据叶适此论,可将北宋古文发展史分为三段:柳开、穆修力诋宋初西昆体而复兴古文为一变,大振于时的欧、曾古文为第二变,王氏用事、程氏发明道学所导致的“文字沦坏”为第三变。事实上,若从“文”“道”二者各自的发展及其关系的嬗变来看,在程氏发明道学、理学语录兴盛之前(即庆历到元祐之间),北宋士人对“道”的体认及相应的言道体式也大致三历其变。

第一变即庆历时期由“章句注疏之学”转变为言说“义理之学”的口义等解经体式,士人倡导由“古之文”发掘“古之道”,其对“道”的认识也从阐发“遗注”转变为探寻“遗义”。“庆历之际,学统四起。”^[6]士人沿柳开、穆修所倡“古文”侧重“言道”的一面,创作了大量口义、讲义、讲疏、经说等议论类的解经体式。此类文体的兴盛肇始于北宋疑经惑传风潮下士林对“注疏体”的反对声浪中,吴曾引《国史》语云:“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7]庆历以降,则风气大变,诚如陆游所言:“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8]正是在庆历士人反对注疏、直拟经传的风气中,北宋性理文本开始萌芽并走向兴盛,人们竞相排异前儒而阐发己意。如柳开“凡诵经籍,不由疏义,晓其大旨即可”;孙复“不惑传注”“得于经之本义为多”;胡瑗则“章句细碎,不足道也”;至刘敞《七经小传》则“大异前儒,不墨守成说”,开宋人批评汉儒注疏之先声。在这种风习下,汉唐义疏体显然难以满足时人直探本经、言说义理的思想需求,而随着理学兴起,其作用亦逐渐被削弱,对新的言道方式和文体的探索与尝试也就应运而生。

口义、讲义、讲疏、经说等解经体式,正是与庆历以来重视本经、以主观己意把握圣人精神相适应的言道文体。“口义体”始于胡瑗《周易口义》^[9],每条目以“义曰”为冠,初具宋代语录体的基本形态,但“口义”之名称已显示了其与“语录”的重要差别,依六经而阐己义的著述原则使其实质上更接近于传统传注类文体^⑤。“讲义体”由口义发展而来,神宗以后渐趋流行,王应麟评其“皆为支离蔓衍之词”^[8],与语录的文体特征颇为类似。此外,讲疏、经解等“说解体”亦盛行于庆历之际,如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易说》,石介《春秋说》,张载《横渠易说》等,也多与语录类文献同列于“经部说解类”或“子部儒家类”。总的看来,兴于庆历疑经疑传风气下的口义、讲义、经说等以“言道”为宗旨的解经体式,一方面依经立义,无法离开经典而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较于“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汉唐注疏,虽增加了发明经旨、阐抒义理的主观性内容,但缺乏汉唐子学著作构思精巧、成一家之言的理论品格。就此而言,“口义”等说解之体还不能称作严格意义上的“语录体”,而是一种介于汉唐注疏与专论式子学著作之间的形态。

除“口义”等解经体式之外,庆历学风的言道方式在“为文”中更直接的体现则是“太学体”。庆历二年,石介入主太学,力排西昆时文,“太学体”风靡一时。张方平论当时“科场文变”云:“至太学盛建,而讲官石介益加崇长,因其好尚,浸以成风,以怪诞诋訕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贍,逾越绳墨,惑误后学。”^[10]“太学体”为文多剽窃经言、滥用古辞,以险怪僻涩为风,时人评曰:“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语,怪诞如‘周公俘图,禹操畚鍤,传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11](2636-2637)}太学诸先生之文作为士子竞相模仿的对象,多为单篇论体古文,如孙复《儒辱》,石介《怪说》《尊韩》《辨惑》《中国论》,士建中《道论》《原福》《原鬼》《随时解》,李觏《常语》《礼论》《易论》等;其时亦有专论式子学著作,如黄晞《磬隅子》(《歆歆琐微论》十卷),此书“体裁文句,皆规橐扬雄《法言》”^[12],每章冠以“磬隅子曰”,乃继《法言》《中说》而后的又一部“仿语录体”论著。大体而言,庆历之际盛行的“太学体”,多模仿《尚书》《法言》等古奥文风,虽使讲道论学之风一时大畅,但用语险怪生僻,片面地发展韩愈道统论,从而走向了古文创作的极端。这种偏激地以仿古、法古为宗旨的言道方式,很快就招致了时人的讥议与砭责。

以嘉祐二年欧阳修排抑“太学体”事件为标志,北宋的言道文体发生了第二变,文章风气由此从泥古的险怪文风转变为以论、策为代表的欧、苏平易之古文。欧阳修对古文体制的创变建基于对“太学体”的反思,所谓“必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谈虚论以求材识之誉。前日庆历之学,其弊是也”^{[11](1673)}。“庆历之学”即石介、孙复、胡瑗等人主持太学期间的学风,为文主“道”,具有明显的道学倾向;而以欧阳修、尹洙、苏舜钦、梅尧臣等人为代表的“嘉祐学风”则讲求以“文”明道,主张“文与道俱”“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11](664)},使古文革新宗旨从侧重“言道”一面又重新转回强调“为文”的一面。彼时古文题材多样,但不乏性理之作。以应“制科”的“贤良进卷”为例^⑥,就有经籍论、义理论、历代论、人物论、地域论、政务论等多种主题,其中性理之作占据了相当篇幅,而如陈舜俞、苏轼、苏辙、李清臣等人的进卷,也无一不对新儒学思潮有所响应。嘉祐士大夫立足经义、以强烈的现实关怀为古文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然以欧、苏为代表的性理古文,虽以“明道”“贯道”为旨归,但“经世”色彩较为浓重,对“道”缺乏详细推求,以至于在理学家看来,不过是以华妙文字“包笼将去”的“万物之理”,往往是“待作文时,旋取讨个道来入放里面”^{[13](3319)},终究“于道体犹有欠阙”^[14]。因而在道学逐渐本体化的趋势下,亦不免为时人所诟病。

熙宁年间,王安石改“诗赋取士”为“经义取士”,推动了北宋性理之学表达体式的第三变。面对“道”的纷纭解释,王氏试图一锤定音,以独断方式设定对经典的理解,使对“道”的认识由“万物之理”走向了“道德”的统一。“经义”作为文体亦随之得以成立并推广,如纪昀曰“经义始宋熙宁”^[15],徐师曾《文体明辨》亦设“经义”一体,并将熙宁创义作为“旧法始变”的重要转折^[16]。从文体层面来看,王安石改革贡举至少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王氏指责嘉祐以来士人“不识义理”、

专务为文,造成经术大坏的局面,其上神宗书曰:“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17]另一方面,为改变庆历以来“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18](907)}的纷歧状况,王氏创立《三经新义》用于科举,取士由以诗赋为主转向以经义、论、策为主,不合“新义”之文皆被废黜。就文道关系而言,科举试“经义”也可看作王安石“欲合文道”的激进尝试,不仅从强调“为文”的一面翻转至侧重“言道”的一面,而且对“道”给予了权威的解说。这种独断的举措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使北宋的古文逐渐走向衰落,导致文体僵化与思想停滞,苏轼即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19](1427)}另一方面,这一变革也客观上为性理文本的产生与流行提供了外部环境,助推了经学义理化的进程。

与以“经义”为重的科举变革相伴随,许多公认的理学经典也在神宗时期纷纷涌现。如熙宁三年张载作《西铭》、熙宁九年又自编《正蒙》;熙宁四年,邵雍写成《皇极经世书》;熙宁六年周敦颐作《通书》;熙宁十年,张载过关中与二程兄弟论道,其门人苏昞录为《洛阳论议》,为记录二程的最早语录。此后性命之学蔚然成风,逐渐形成了蜀学与洛学在辞章与义理方面并峙的格局。熙宁前后,北宋五子为代表的理学家纷纷著文言理,士人的思想表达从“议古”走向“拟圣”,其文体形式亦从“传统的经注、经解形式而以论文、辨说、讲演(口义)等方式化古于今(或者叫借圣人立言)”逐步走向了摹拟经典,如《正蒙》《通书》模仿《论语》,李觏《常语》类似《孟子》,《皇极经世》模仿《周易》等“仿圣人立言”的阶段^[20]。

综而言之,从口义、讲义等“经解”体式到经论、经策等“古文”,再到科举时文之“经义”,北宋士人言说义理的几种主要文体在不同程度上对“为文”与“言道”各有偏重。各派都因对“道”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而相应地对“文”有不同的规范,且彼此之间争讼不已。庆历学风其“道”泥古,为文险怪;欧、苏等之古文继起,讲求以“道”经世,文至道明,但难免导向“文”重“道”轻;王安石则截断众议,“欲以其学同天下”,却使“文字”衰颓。可见,尽管古文运动自韩愈始即主张混同文道,但“为文”与“言道”的矛盾张力在北宋性理文本中却愈演愈烈,始终无法消解,至二程则走向“作文害道”的极端分裂。而“语录”作为“文章之一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不但成为道学家言说义理的重要方式,且对古文及诸种文体造成严峻挑战。要说明何以如此,应继续顺着文道关系,从“周程、欧苏之裂”的思想转型层面,探讨理学家对“道”新的认识及对言道文体新的需求。

二、北宋理学语录产生的文论基础及思想动因

熙丰年间,新学昌盛,与蜀、洛、朔三党构成的旧党形成对垒之势;降及元祐,旧党执政,旧党内部逐渐形成蜀洛之争的学术局面。由熙丰至元祐,士大夫群体逐渐由经术、性理、文章的三足鼎立转变为“文”与“道”的双峰对峙。《扈虱新话》云:“唐文章三变,本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21]随王安石所代表的经术派古文家的下台,以苏轼为代表的“议论派”古文家与以程氏为代表的“性理派”之间的争论则愈加尖锐^⑦。面对蜀洛之争所形成的文道分裂的局面,宋人已颇有共识。如赵孟坚诗云:“孔孟至皇朝,文与道相属。溯自熙丰后,专门始分目。欧、苏以文雄,周、程理义熟。从此判而二,流派各异躅。”^[22]吴子良《笈窗续集序》称:“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23](2)}可见,在宋人看来,元祐蜀洛之争加剧了宋初以来“古文”与“道学”间的学术分途,刘坝将此总结为“周程、欧苏之裂”^[24],此种分裂反映了一直隐伏于唐宋古文运动发展脉络的“文道观”最终由“文道相属”走向了“文道分判”的二元对立。

“周程、欧苏之裂”不仅表征着文道思想的分歧,也显示出文体分化的趋势。由于两派对“道”的界定不同,其表达“道”的主要言说方式产生了巨大差异。土田健次郎论及欧、苏与周、程对“道”

理解的区别,认为前者“试图正确地框定思想性言说的界限”,后者则“对思想性言说的可能性抱有乐观的态度,试图以其议论彻底覆盖一切”^{[25](398)}。易言之,欧、苏之道乃多元化的“万物之理”,试图以多样化的文学性表达为性命天人的议论框定可知的界限。而周、程之道则是以“道”为本的一元论,程颐将“理”提升为最高的本体范畴,基于其“理一分殊”的道本论,提出了“作文害道”说,认为专务辞章会阻碍对“道”的修习。其云:“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26](239)}在他看来,今人所作诗、文对“道”皆有妨害,今人之文,“专务章句,悦人耳目”;而今人之诗,即便如杜甫之“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亦不过是于世无补的“闲言语”^{[26](239)}。

蜀洛对立催生理学家“作文害道”“玩物丧志”等文艺观的同时,“语录”与“古文”的文体分野也愈加显著,如杨慎所言:“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27]“文”与“道”的分判既是北宋古文运动由胜利走向式微的重要转折,也道出了“语录”一体发生的文化语境与其历史必然性。正是基于这一严格的学术史义涵,不少清代学者才将语录的发生归究于元祐之后洛学的兴盛。如顾炎武认为“语录”兴起于二程,所谓“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28]。若果如顾氏所言,那么为何直至二程才开始普遍采用“语录”的形式言说义理?又为何直至南宋,“语录”才随程朱理学的展开而流行开来?这一独特的文体选择,实际上与理学的思想追求与哲学实践联系密切。

首先,语录这种偏重主体内在心灵直接表达的文体特征,与二程所强调的“默识自得”乃至“圣人之道”的本体论追求高度契合,这是其成为洛学性理表达主要方式的根本原因之一。程颐所构建的“道”一元论带有浓厚的“拟圣”色彩,主张人人皆可通过自身的修养达到圣人境界,所谓“二程之学,以圣人为必可学而至,而已必欲学而至于圣人”^{[26](420)},程颐将“道”聚焦于内在道德主体的观念加速了两宋之际思想文化领域的“内在转型”。刘宁曾从精神内涵上描述了宋学内转思潮下“拟圣”之学与理学文体选择的关系,认为语录体、札记体是对“立足内在的道德主体,对儒家精神作深度探求”的思孟学派表达方式的继承^{[2](124)}。

如果延续这一颇具启发的思考路径,则会发现程颐的道本论思想与理学语录发生问题之间的深刻联系:一方面,基于其道本论,程颐将训诂之学、辞章之学皆排斥于道学之外,如其所言:“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26](95)}立足于二程的道学立场,则石介等“庆历之学”趋于“古”,“欧苏之文”落于“文”,“荆公之学”则偏于一家之道,都未得“道”之精髓。而其言说义理的代表性文体如庆历经解、嘉祐古文、熙宁经义等,也就不足以阐发“道”之精微。另一方面,程颐将“道”聚焦于内在的道德主体,认为“道”乃人人可学而自得的“天理”,通过对本源性的“道”与圣人气象的默识体认,人人皆可变化气质、学而成圣。唯有将道德修养置于学之首位,“抒发胸中所蕴”,才能“自成文耳”^{[26](239)}。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意味着对“言”的衡量取决于“德”的标准。通过界定“求道”与“为文”的先后次序,理学家不仅区分了“作文”与“语录”的关系,如朱熹对张绎记语录“多作文”而“失其本意”表达了不满,认为“不若只录语录为善”^{[13](2480)},同时也对语录本身采取了辩证态度,如程颢即批评谢良佐录“《五经》语作一册”的行为是“玩物丧志”,而程颐则称赞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语,往往录得都是”^{[26](252)}。可见,在二程看来,言语贯通、辞气顺畅建立在“道德”主体的内在修习上,“道”是否传远,与“言”之文与不文已关联不大。相反,语录之言语的好坏却取决于达“道”的程度,以及“道”本身格调的高低。由此,“语录”作为直录言语的初级性文本,一方面满足了理学家直言心迹、求道自得的道学需求,另一方面其“成文”与否又需以“得道”多少来衡量。

其次,程门后学对语录的自觉编纂与传播,使理学语录得以确立并广泛流行,此举作为理学语录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与其求道方法——涵养用敬、进学致知的存养工夫紧密相关。就语录的生成

过程而言,其并非自著,而是师生授受、往复问答的产物。因此,与一般文体的创作不同,语录具有“言说”与“记录”(或编撰)的双重特性。语录的记诵与编纂不仅是该文体生成与定型的基本过程,也是理学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等修养方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现。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在道德认知层面,程颐提倡主一用敬、格物穷理的修养工夫,而随物观理、涵泳圣人言语正是其持敬、格物认识论的重要方式。一方面,伊川注重对日用伦常的阐发,而语录以口传学、直指事理的言说方式恰好十分贴合其格物工夫的基本要求,正如其所言:“以书传道,与口相传,煞不相干。相见而言,因事发明,则并意思一时传了;书虽言多,其实不尽。”^{26}可见程颐并不拘泥于传统经注形式以传道,而充分肯定了口传语录在因事发明、随物穷理方面的文体优长。另一方面,程氏“主敬”工夫强化圣人言语神圣性的同时,也肯定了学者玩味圣人语录以体认天理的存养路径。所谓“言敬,无如圣人之言。……但存此涵养,久之自然天理明”^{[26](169)},即道出了圣人言语作为表达天理之物质载体的重要性所在。由此程氏对为学求道提出了更切实的要求,如曰:“凡看《语》《孟》,且须熟玩味。须将圣人之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26](285)}在此原则下,门人弟子为“学道”之便利,往往大量编纂语录以“玩味圣人言语”,如谢良佐“录《五经》语作一册”以供为学,并将语录以“义理”为条目作专题式的编类;而南宋张栻编《洙泗言仁录》,也实践了程氏玩味圣人言语的为学方法。

而在道德实践层面,程颐改造了孟子“集义”说,使其工夫论呈现出积极的履践义涵^⑧。程颐倡导“持敬”以直内,而其向外的修养方式则为“集义”,所谓“敬只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须当集义。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26](206)}。“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敬义夹持”工夫方构成程氏修养论的完整内容。伊川之“集义”主张通过格物的积累达到义理的贯通,如曰“须是集众理,然后脱然自有悟处”^{[26](175)},朱熹释云:“集义,犹言集善,盖欲事事皆合于义也。”^[29]这种独特的道德实践工夫与宋儒语录的文本形态及美学标准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一方面,“集义”原则影响到第二创作者对语录的记诵与编纂。就语录之记诵而言,如果说单条语录乃一事一物之理的呈现,那么语录之著作或可视为“众理”的集合;而就其编纂来看,语录往往以抽象义理或特定命题进行专题整合与编类,其形式呈现出“以类相从”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从语录的言说主体来看,“集义”工夫可使学者变化气质,达至脱然贯通、学为圣人的境界,如此,其语录才能真正成为“有德者必有言”的文本典范。在此意义上,“言”与“文”亦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统一,而非因专务辞章而以文害道。正如有学者所言,儒家语录的目的在于“将逻辑和日常性的规范意识推究到终极之处,并于身体同化”^{[25](26)},此说即提示着语录这一著述方式与理学工夫论在道德实践层面的共同旨趣。

总之,伊洛之学主张在日用伦常中采取敬义夹持、内外结合的修养方式,其落脚点终置于“道”的修养上,崇尚“自得”,而非舍本逐末。反观苏学,由于东坡将“道”界定为“万物之理”,其致道方式又称“无心而一”“与造物者同游”,故其为文倡导“如风吹水,自成文理”^{[18](2144)};而其体物则曰“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18](1418)}。这种心物交融、文理自然的追求更类于佛道之直觉与颖悟,于宋儒“格致”之功却不甚措意。从程颐的立场来看,苏轼这种“以文为主”的外在工夫终非“圣人之学”^{[26](319)},不足以体认本体论意义上的天理^⑨。相较而言,“以口传心”的语录反更能“发明意思”、传述义理。易言之,较于欧、苏辞章之文,语录俨然成为程氏言说“道体”最为贴切的表达载体。而正因与蜀学的思想交锋,程颐才愈加坚决地主张“作文害道”,其以“语录”言理传道的著述方式亦才能得以伸张,并经程门后学的发扬而广为流行。

三、南宋后“语录”与“古文”之文体互动现象

自程氏发明理学,宋儒语录也因理学官学化进程而全面勃兴。随着朱熹对《二程遗书》《伊洛渊

源录》的相继编订, 以及《朱子语类》《近思录》等语录经典的昭世, 语录作为“文章之一体”得到最终定型。然而, 在众多文士眼里, 理学语录的流行对文学造成了极大戕害, 以至他们不断发出“洛学兴而文字坏”“语录兴而古文绝”的严厉批评。宋末周密即指出: “宋之文治虽盛, 然诸老率崇性理, 卑艺文。……水心叶氏云: ‘洛学兴而文字坏。’至哉言乎。”^[30]明代李梦阳称: “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31]清人曹肃孙则谓: “六经四书皆天地间至文, 自讲学者好读语录, 而古文之统遂绝。”^[32]当代学者对此亦多有阐发, 如祝尚书所言: “古文则在相当程度上成了理学家‘载道’的工具, ‘语录体’泛滥, 文学性的古文创作衰落。”^[33]何寄澎更直切地指出: “南渡以后……道学笼罩, 语录体兴, 古文遂不能不为之芜绝。”^[34]“古文”与“语录”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几为古今学者之共识。

然而, “语录兴而古文绝”的论断不免偏颇。所谓“语录出而文与道判”, 固然揭示了“语录”与“古文”之间某种分化趋向, 但二者绝非完全割裂、互不影响。纵览南宋文体演变的整体历程, 可以清晰地看到“语录之文”与“辞章之文”(含古文)间既相互对峙、又融合互渗的复杂关系。

一方面, 南宋后“语录”对文章创作的侵扰始终不绝如缕, 其影响并不限于古文, 亦波及诗赋、科举时文等多种文类。自场屋应制之作至日常书札诗文, 皆浸染语录之习气, 形成南宋后文类文体的“泛语录化”现象。以下仅就两方面, 略论其表现:

其一, “语录”随洛学之兴而逐步渗入科举时文的创作之中。绍熙年间, 洛学之势益盛, 理学语录之文渐兴。至庆元党禁, 理学被目为伪学, 在时人对其批判的言论中, 常能见到对语录损害场屋文风的指责。如《宋史纪事本末》称: “科举之文, 成式具在, 今乃祖性理之说, 以游言浮词相高。”^[35]《文献通考》载刘德秀疏云: “请将《语录》之类, 并行除毁。”叶燾亦上言: “士狙于伪学, 专习《语录》诡诞之说, 《中庸》、《大学》之书, 以文其非。”^{[18](932)}至理宗端平、淳祐以后, 场屋律赋几乎全然道学化。《癸辛杂识》描述“太学文变”曰: “至端平江万里习《易》, 自成一家, 文体几于中复。淳祐甲辰, 徐霖以书学魁南省, 全尚性理, 时竟趋之, 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36](932)}此时的性理之学已在科场作文中取得主导地位, 而其带来的文风转变, 则被谢枋得痛心疾首地称为“七十年来, 文体卑陋极矣”^[37]。性理之学应用于科举之文的重要表现之一, 即士子剿取“语录”以作文章。谯仲甫致书魏了翁曰: “今士习之弊, 不本之履践, 不求之经史, 徒剿取伊洛间方言, 以用之科举之文, 问之则曰‘先儒语录也’。”^[38]甚者专门将“语录”分类编纂以便科试之用, 各种语录汇纂类的科场用书(如常挺《诸儒性理文锦》、佚名《诸儒鸣道集》等)即在此情况下大量涌现。罗大经对此批评道: “近时讲性理者, 亦几于舍六经而观语录。甚者将程、朱语录而编之若策括、策套, 此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39]吴渊亦指斥“语录”用之于科举, 以致仕子“志道忘艺, 知有语录而无古今”^{[40](24)}。至明清科试, 甚至明确要求士子在八股文的写作程式中“带入古人语气作文”, 并掀起一股“代言体拟古文章”的创作风潮^[41]。时风之盛, 可见一斑。

其二, 南宋至明清文坛, “以语录为诗”“以语录为文”的创作现象也相当普遍。若说科举时文的“泛语录化”是程朱之学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取胜的直接显现, 那么一般诗文的“泛语录化”则更多反映了时代精神的间接影响。就诗的方面而言, 刘克庄在论及宋人文集时, 曰: “近世贵理学而贱诗, 间有篇咏, 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42]清人沿袭这一批评, 称: “宋诗似策论, 南宋人诗似语录。”^{[43](2023)}《筱园诗话》云: “自宋以来, 如邵尧夫、二程子、陈白沙、庄定山诸公, 则以讲学为诗, 直是押韵语录。”^{[43](2407)}就文的方面而言, 相关论说更不胜枚举, 如王夫之即对明代“以语录代古文”的创作现象加以猛烈抨击, 认为这致使文章芜秽、文风弱靡。^[44]四库馆臣在评论宋明儒者的诗文作品时, “如语录之体”“近乎语录”等评语更是所在多有。此种“泛语录化”现象被视为该时期文学中一种普遍且流行的倾向。

另一方面, 在理学官学化及诸种文类的“泛语录化”进程中, “古文”亦逐渐构筑其自身的文统

谱系,并力图抵制语录习气对“文”的侵扰。早在孝宗时期,随陈骙《文则》、陈傅良《止斋论诀》、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王震霆《诸儒批点古文集成》等古文评点的相继梓行,宋代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古文正典体系渐趋成熟。这种以欧、苏为辞章之宗的古文统绪对语录影响甚巨:在文学批评领域,自南宋谯仲甫所谓“语录,一时门弟子所传抄,非文也”^[38]以来,“语录非文”之命题应者云集,钱大昕即称:“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45]顾炎武亦曰:“自嘉靖以后,人知语录之不文。”^[46]此论的出现意味着“语录”与“文”已然形成某种对立的关系,二者间的复杂关联,纵观前代绝无仅有。而就文学创作而言,自南宋以迄元明,“语录”与“古文”之畛域日渐分明;逮及桐城,方苞、李绂、姚鼐诸家不仅将语录悬为古文例禁,“语录不可阑入古文”的理论主张也被文坛奉为圭臬。

正因如此,南宋以来“语录”与“古文”的交互格局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吊诡局面:一方面,在以欧、苏古文为文章正宗的文统视阈中,语录因其“芜杂俚近”败坏斯文,深为时论所诟;另一方面,在宋明以来道统叙事的笼罩下,诸文类的“泛语录化”现象却相习成风,屡禁不止。此现象折射出“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的内在矛盾:随着理学的官学化进程,程朱之“道”较辞章之“文”取得了优势地位,语录遂能假“道”之势而成为士人言说义理的主要方式之一,并长久侵扰“文”之领域;然语录之“文”因过于依附“道体”,其“文体”自身的规定性与统一性则被削弱,故虽风靡一时,却难掩鄙俗空疏之弊,其下者既无言道之胜,亦失文辞之美,终沦为“不能解其为何等文字”^[47]的下乘之作。在此背景下,南宋以来“欲合周程、欧苏之裂”的学者代不乏人,其具体方法则是萃取语录之义理旨趣、弃其俚俗之文辞,进而合以欧、苏之体法,如陈栎主张“由韩柳欧苏词章之文,进而粹之以周程张朱理学之文也”^[48],王郁倡言“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49]。这种理念也落实于当时创作实践,如吴渊称赞魏了翁之文立足“程、张之问学而发以欧、苏之体法”^{[40](25)},吴子良在《笈窗集》跋语中评陈耆卿之文为“挥周、程之旨趣,贯欧、曾之脉络”^{[23](1)}。总之,自吕祖谦、叶适、陈耆卿等人而下的永嘉一脉,皆试图消除周、程之“道”与欧、苏之“文”分裂所致的隔阂。究而言之,永嘉学派这种弥合文道的努力,既表明了理学语录对文学实践所带来的强势影响,也彰显着古文传统的蓬勃生命与深厚底蕴。二者交互渗透,亦相对独立,共同形塑着南宋以迄明清的文论思想与文学话语体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宋代语录之勃兴非出偶然,其不仅是北宋复杂文体语境中的独特选择,亦实与周、程(以至朱熹)对“道”及修道工夫的特殊体认密切相关,乃两宋之际文体嬗变与思想转型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独特景观。综观北宋言说性理的三种主要文体类型,无不为北宋士人的思想表达提供了丰富的文体选择。然其不同程度地偏于“重文”或“重道”两种倾向,难以有效兼顾“文”与“道”的需求,虽在不同历史阶段尽显优势,却又无法适应另一阶段与群体的表达需求,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贬责与排抑。至二程发明道学,与欧、苏辞章之学形成对峙之势,既导致了思想领域中的“周程、欧苏之裂”,也造成了文体层面“古文”与“语录”的分野。随着洛学对“道”论的改造,其言“道”的形式随之发生了重要改变,文体形态遂由重视辞章的“为文”传统转向“直言义理”的道学表达。总之,儒学思想的转型对思想表达的文体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文道分裂、重道轻文的历史语境则为“语录体”的复兴与定型提供了重要契机。

基于这一思想转型的视野,所谓“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的文体学意义便愈发清晰。唐宋八大家自韩愈的“文以明道”至欧苏的“文与道俱”,实际上都主张文道为一体,道不在文外,然自周敦颐首

倡“文以载道”之说,即已大开道学家“岐文与道为二”的风气,最终导向道体文用、道本文末的主从关系。“语录”自周程后的兴盛,所表征的不仅是“为文”妨害了“道”的修习,故而分立文道,更在于理学之“道”可在口授心传之间体之察之,不待“文”而自明。而在程朱理学推动的儒学本体化进程中,“非文”之语录之所以能长久地侵扰传统深厚的“文”之领域,也正是因为理学之“道”相对于辞章之“文”取得了优势地位,致使“语录”能够假“道”之势,而对诗、文的侵入始终不绝如缕,以至桐城诸贤汲汲以摒除语录、捍卫文法为要务。此外,随着南宋后古文评点的兴起、古文创作的盛行,“语录”因其俚俗而获诟于“古文”醇雅清正的审美规范,而愈加为正统文学观念所排斥,成为身份模糊、体制不清的文本类型。由此,若从文体嬗变与思想转型相结合的视角观照文体的发生、流变等问题,或可对文体学理论提供新的“辨体”案例;而通过对语录文体问题的探讨,亦能更深切地体察到两宋思想转型过程中文道观念的丰富意蕴与独特内涵。

注释:

- ① 纪昀首次明确指出语录一体为南宋诸儒所创,其云:“其诗其文,皆如语录。然自南宋诸儒开此一派,文章亦遂有此一体。”近代学者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的讨论,亦将语录视作自南宋肇始的文学史新阶段的标志性文体。如郭绍虞将中国文学分为五个时期,南宋至现代为以“语录体的流行,小说戏曲的发展”为标志的“语体”时代。又如胡小石《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作“文学七期”的划分以元和至南宋前期为第四期,并以古文与语录的兴替为其枢纽。分别参见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1页)、郭绍虞:《中国语言与文字之分歧在文学史上的演变现象》(《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96页)、胡小石:《胡小石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第79页)。
- ② 分别参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载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88页;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附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0页;方东树:《书林扬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梁启超:《小说丛话》,载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7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5—106页;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朱自清:《朱自清学术文化随笔·论雅俗共赏》,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载《刘申叔遗书·左盦外集》卷十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7页;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72页;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杨树增:《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 ③ 两宋之际文体领域之变革如注释一所言;而思想领域的变化宋史学家刘子健则论之甚详,其说在内藤湖南等学者主张的“唐宋变革论”之外,认为两宋之际乃中国文化“内向化”的转折关捩。参见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 ④ 关于性理之学的表达体式学界存在不同定义及分类:陈植锷将仁、英两朝分为疑传派、疑经派、议古派与拟圣派等四种类型;刘宁则将“理学思想的文体形式”区分为“语录体、札记体子书”与“议论体的解经之作”两大类;方笑一则将宋代“经学文本形态”分为经注、语录、经论或经注三种;吴国武认为“北宋性理文本”主要以议论类经解体式与语录类子书体式为典范。本文将统一采用“北宋性理文本”这一称名界定此种文本形态。参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22—236页)、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方笑一:《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多维观照——以北宋古文理论与创作为中心》(《人文杂志》2010年第5期)、吴国武:《经学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33页)。
- ⑤ 据朱彝尊《经义考》“瑗讲授之余,欲著述而未逮,倪天隐述之。以其非师之手著,故名曰‘口义’”,则该书命名为“口义”乃是不敢比肩于“传”的妥协选择。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卷十七《胡瑗易传》,载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8页。
- ⑥ “制科”指由皇帝特别下诏的不定期考试,“贤良进卷”即应试时针对国家政策与方针而撰写的成组式专题论文。参见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333页。
- ⑦ 如有学者注意到自王安石设置经义考试之后,程颐就明确提出“文章之学”的概念,此概念与训诂之学、儒者之学并列提出,是对文、道分立的明确体认。参见宁俊红:《论古代“文章学”的兴起与嬗变》,《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2期。

- ⑧ 学界关于程颐“集义”工夫多有探讨。例如,肖永明认为自程颐起,宋儒始训“集”为“积”,“集义”转为为积义或积善之意,并“从一描述语转化为一种积极的道德实践”,而“集义”的修养方式至朱熹及其后学立论更甚精微;李景林也指出程颐的工夫论可概括为主一、用敬与集义。参见肖永明、谢川岭:《宋明理论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以对〈孟子〉“集义”的诠释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6期;李景林、杨静:《诚敬存养与格物穷理——二程人格修养学说述论》,《人文杂志》2019年第7期。
- ⑨ 朱熹明确指出欧、苏等人因“格物”工夫的缺乏而于“理”不识,谓其读书、作文皆“不曾向自身上做工夫”,不过“以文人自立”。参见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13页。

参考文献:

- [1] 贾德讷. 宋代的思维模式与言说方式: 关于“语录”体的几点思考[M]// 田浩. 宋代思想史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394-425.
- [2] 刘宁. 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3] 陈植锽. 略论宋初古文运动的两种倾向[C]// 邓广铭. 宋史研究论文集 1982 年年会编刊.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431-451.
- [4] 郭绍虞. 试论“古文运动”: 兼谈从文笔之分到诗文之分的键[M]//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 下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88.
- [5] 叶适. 习学记言序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696.
- [6] 黄宗羲, 全祖望. 宋元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51.
- [7] 吴曾. 能改斋漫录: 卷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28.
- [8] 王应麟. 困学纪闻[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291.
- [9] 赵振. 《〈二程语录〉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28.
- [10] 毕沅. 续资治通鉴: 卷第四十八[M].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 78.
- [11]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12] 阮元等. 四库未收书目提要: 卷三[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5: 41.
- [13] 朱熹. 朱子语类[M]. 黎靖德, 编.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319.
- [14] 朱熹. 朱子全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1690.
- [15] 纪昀. 纪晓岚文集: 第一册[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270.
- [16] 徐师曾. 文体明辨序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139.
- [17]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5135.
- [18]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9] 苏轼. 苏轼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0] 陈植锽. 北宋文化史述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218.
- [21] 陈善. 扞虱新话[M]// 丛书集成初编: 第310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3.
- [22] 赵孟坚. 彝斋文编[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81册.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7.
- [23] 陈耆卿. 笱窗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78册.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 [24] 刘埙. 隐居通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7.
- [25] 土田健次郎. 道学之形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26]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27] 杨慎. 升庵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637-638.
- [28] 顾炎武. 顾亭林诗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31.
- [29]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32.
- [30] 周密. 浩然斋雅谈[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15.
- [31] 李梦阳. 空同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604.
- [32] 曹肃孙. 与贾运生先生论文书[M]// 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590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571.
- [33] 祝尚书. 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7.
- [34] 何寄澎. 北宋的古文运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99.

- [35] 陈邦瞻, 等. 宋史纪事本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868.
- [36] 周密. 癸辛杂识: 后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65.
- [37] 谢枋得. 谢叠山全集校注: 卷一[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22.
- [38] 魏了翁. 渠阳集: 卷十三[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203.
- [39] 罗大经. 鹤林玉露: 丙编卷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33.
- [40] 吴渊. 鹤山集序[M]// 全宋文: 第 334 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 [41] 王涵. 论明清科举后场的“拟古”文[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3): 205-213.
- [42] 刘克庄. 刘克庄集笺校[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4596.
- [43] 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44] 王夫之. 姜斋诗话笺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08.
- [45] 钱大昕. 嘉定钱大昕全集: 第 7 册[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488.
- [46] 顾炎武. 顾炎武全集: 第 19 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749.
- [47] 王水照. 历代文话: 第 4 册[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4008.
- [48] 陈栎. 太极图说序[M]// 全元文: 第 18 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115-116.
- [49] 刘祁. 归潜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4.

“Emergence of the Yü-Lu and the Division of Wen and Dao”: The stylistic context and intellectual motives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neo-Confucian Yü-Lu in the Song Dynasty

LU Yue, YAO Aib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popularity of the genre of Yü-Lu (语录体, Recorded Conversations) represent a distinctive manifest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o-Confucian thought and stylistic evolution of literary culture in Song dynasty. To understand the debates over “Yü-Lu as non-literature”(语录非文) and the phenomenon of “generalized Yü-Lu-ization”(泛语录化) in late Southern Song, it is essential to trace back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Tang-Song Classical Prose Movement. The Neo-Confucian texts of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experienced a development encompassing three stylistic types: “canonical exegesis”(经解体), “classical prose”(古文), and “scriptural prosthesis”(经义)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n (文) and Tao (道), each of these types had its distinct focus, yet none succeeded in resolving the intrinsic tension between “creating articles appropriately” and “conveying the truth”.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uo School (洛学) by the Cheng brothers (二程), the resulting ideological split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writers and Taoist scholars”(周程、欧苏之裂) also led to a stylistic divergence between “classical prose”(古文) and Yü-Lu (语录), providing a more direct and intimately connected form of expression for conveying the Way (言道). Neo-Confucian Yü-Lu texts emerged against this backdrop of divergence between literary forms and Confucian doctrine. Its direct recording of thoughts and sentiments not only accorded with Luo School’s ontological emphasis on “modeling sages”(拟圣), but also met the cultivation demands of the Cheng brothers’ practice of maintaining reverence and investigating principle (居敬穷理). With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state education, the Yü-Lu gradually became integrated into the literary discourse.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Yü-L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form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fers a novel approach to stylistic studies.

Key words: the genre of Yü-Lu (Recorded Conversations); Classical Literary Movement; genre selection; concept of Wen (writing, 文) and Tao; Daoism

[编辑: 陈一奔]